

文學

從哈麗特·洛（希拉里）的日記看 19世紀澳門性別的社會生活

Rogério Miguel Puga^{*}

“每天我都驚嘆，這是多麼有趣的世界，它的人民也是多麼有趣！你也許嘲笑對澳門這個世界任何東西的看法，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們看到了無限的品德……。

哈麗特·洛《我母親的日記》，1831年9月17日，1900年，第104—5頁。

1829年5月24日，來自馬薩諸塞薩利姆的一個貴格會教徒家庭的哈麗特·洛（1809-1877）乘坐蘇門答臘號輪船前來澳門。在爾後的四年中，它將陪伴她的叔母，威廉·亨利·洛（1795-1834）的妻子阿比卡伊·克那科·洛，於是她成為了有記載的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女青年。這位20歲的年輕姑娘寫下了幾本日記並有數封致其姐姐“瑪麗”（瑪麗·安，1808-1851）的信件。後由其女凱瑟琳·希拉里於1900年結集出版。¹

在位於大堂斜巷高處²大堂圍2號的居所內，年輕的洛描繪了澳門及廣州多元文化生活，刻畫了澳門城不同社團絢麗多姿的方方面面，為傳播澳門最典型的特徵—異國情調作出貢獻。此種異國情調在彎曲狹窄的街道

* 東方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本文為在2002年1月26日在里斯本技術大學社會及政治科學系主辦之第五屆中國文化週上宣讀論文之簡本。

1. 哈麗特·洛希拉里（簡稱洛）《我母親的日記：一位年輕的女子在馬尼拉、澳門及好望角渡過的五年（1829-1834）日記》，凱瑟琳·希拉里作序及註釋，1900年。初次引用本書後，括號中為引文所在的頁碼。在腳註中以HL表示。
2. 他們租用的房子於1979年被拆毀（參見文德泉《一位美國姑娘眼中的19世紀澳門》，1981年，第1頁）。關於大堂斜巷，參見文德泉《澳門地名》，第2卷，1981年，第5頁。除了文

中，與歐洲的鄉風交融。在這位西方旅行者的字裏行間，一片由聲、色、形、味及意構成的感官歡樂氣氛躍然紙上。我們將研究日記所記載的4年並附之其信件。³ 在此，哈麗特描繪了華南人文生活的場景，如同克利福德·格爾特茨所言，（人種史）文化分析的方法類同文字的文學評論：除了意義的結構……並且確定他們的社會背景和意義……。做人種學研究如同是設法讀（在閱讀結構的意義上）原稿……。⁴ 我們將看到此語完全適用於本文的解讀。

作為一種外國人對澳門社會文化生活的描寫，本文為某些解釋及一些歷史人類學情況提供了優良的信息來源，因為作者是美籍新教徒。其文的中心以不同的方式透視了她所感覺到的現實，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有些可以列入目前我們稱為宗教及種族偏見的範疇。書的觀點是一個貴格會女青年教徒的看法。她遠離故鄉的那種安全與社會行為準則，在1829至1833年間應威廉·亨利·洛的請求來澳。威廉·亨利·洛是美國商行旗昌洋行⁵的負責人。1824年通過另外兩家位於澳門的美國公司珀金斯洋行及羅素洋行的合併而成立。它促進了在澳門的美國貿易⁶，後遷往臨近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據伊麗莎白·巴爾稱，“在過去的十年間，女權評論家參與了兩項要求計劃：發現被遺忘的婦女作家……並且再閱讀婦女作家……發現她們作品中關於婦女的信息”。⁷ 據此說並通過我們對關於美國女作家的參考書的檢閱，我們得出了如下結論：哈麗特·洛的日記相對來說未得到重視，不見

德泉，高美士在1966的《澳門歷史之頁》上也發表了本日記的一些片斷。近期，左倩萍在《澳門雜誌》1999年第84，85及86期（第2系列）：4月（第45-53頁），5月（第4249頁）及6月（第4451頁）上也有發表。

3. 為補充日記的內容，我們還利用哈麗特寫給其他家人的信件（“締約前的信件”）。這些信件由其孫女埃爾瑪·洛伊內斯在《中國貿易》中發表。
4. 克利福德·格爾特茨《文化詮釋》，1993年，第9頁。
5. 此美國公司於1818年由美國康涅狄格斯托寧頓人氏羅素成立。1824至1830年期間，費利浦·安米登是該公司的股東。
6. 參見道斯《金色的集中居住區：在廣州的美商僑團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形成，1784-1844》，1997年，第143-189頁。作家威廉·亨特是哈麗特叔叔的職員。1837至1842年間，為該公司的股東。在其1885年出版的《舊中國雜記》一書第269-70頁上描寫了洛家在1831年舉行的一次晚宴：“1831年，運氣不好，我應旗昌公司東主威廉·洛的妻子洛夫人的邀請來澳門。拿當地的話說，我是年輕的管家。”
7. 巴埃爾（Elizabeth R. Baer）《詹妮·伊爾及安托萬內特·克斯瓦的婦女團體》，1983年，第131頁。

於英國或美國女作家文學評論之例。⁸鑒於本書的重要性及其萬花筒般豐富的内容，它涉及了性別，女子日記，⁹（澳門）本地史，葡萄牙人及外國人在遠東的情況，此乃咄咄怪事。正是此種多元的意義使得本書在對美國人在中國的情況及19世紀的澳門歷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凱瑟琳·希拉里在書序中有如下警示：

“本日記的首要意義在於無作家謊言的個人認識，當然，它為19世紀頭30年的社會生活及旅行提供了一些片斷，當時蒸汽輪船航海仍處於童年期，現在屬於理所當然的海船的豪華在當時仍不太為人所知。因此很意識到這種航行需要四或五個月時間，至少，在伸手可及的中國，從這裡發出的信件幾乎在一年後纔可以得到答覆……這裡無罐裝肉、水果或蔬菜那樣的東西……。並且沒有可能在船上洗滌任何東西，要帶大量的亞麻布衣服，……各種內衣至少帶六打……為把旅客從溫帶送到熱帶再返回。可以想像，

-
8. 我們查閱的許多著作對本書作者無任何涉及，例如，戴維森（DAVIDSON, Cathy e Linda Wagner – Martin）（主編）《牛津美國女作家指南》，1995年。作者的女兒在日記出版序言中承認了哈麗特·洛的著作對女權或性別研究的重要性：“這對女人的性格來說是有趣的，在中國居留期間，可觀察她的頭腦和個性在娛樂和體驗中的發展”（第6頁，黑體為我們所加）。
9. 日記體的不同特徵使它可以被分為一種亞體。它是對事件及（共同）生活的系統記載，“日記特性最主要的基礎是斷續的敘述，……它是一種間斷性的敘述，它產生於歷史的暫停時刻，它是作者每日獲得的經驗。”（參見雷伊斯及洛佩斯（REIS, Carlos e Ana Cristina M. Lopes）《敘述學字典》，1994年，第105頁）。弗澤吉爾（FOTHERGILL, Robert）《私人編年：英國日記研究》，1974年，第11頁上聲稱，日記應該被視為“作為‘感覺’歷史的一種表現形式——社會及文化時代事件的一種在個人理念層面的反射。”馬修斯（MATHEWS, William）在《1442至1942年間英國日記題解書目》，1950年，第xv頁上也說：“日記是作者對其感興趣的東西的個人紀錄，通常每天撰寫。紀錄自己敘述的東西，寫的都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整個敘述有組織，但形式是自由的。”根據弗澤吉爾的分類法，我們可以將哈麗特·洛的日記視為“個人備忘錄式的日記”（第17頁）。至於私人日記讀者的形象，哈麗特布洛戈特（BLODGETT, Harriet）在《女性時代的世紀：英國婦女私人日記》，1989年，第8頁上聲稱：“對讀者而言，所關心的是日記的形式，給它一種緊湊的質量，而不是一種類似小說或戲劇的懸念。然而，儘管無寫作計劃，但日記不是雜亂無章的。讀者會等待和發現日記所提供的完整的事件，模式，序列，或其縈繞的主題。”正是為了尋找“自己的房間”弗吉尼亞·沃爾夫在《日記》，1977-1984年，第266頁上將日記定性為“一個寬大的手提箱，可以在內放入大量的可能性和結尾。”（1919年4月20日）。而寧（NIN Anais）在《未來的小說》，1969年，第142頁上則將日記定性為“溝通的渠道”。關於此問題可參見若色特（ROUSSET, J. Rousset）《日記，一種無對象的文體？》，1983年，第435-443頁；

一個活潑的年輕女孩，剛剛渡過她的第二十個生日（在一個十二個孩子家庭的中，祇有一個比她大），突然要從馬薩諸塞薩利姆這樣一個沉悶單調的鄉下城市，在東印度公司的恩惠之下，到中國來生活，接觸當時英國社會的所有豪華和禮節。（第5－6頁）。 ”

顯而易見，作者之女在讀者與作者的聲音及世界開始對話之前，在讀者的心目中作一環境及上下文的準備，涉及了艱辛的旅途，氣候的變化，生活方式的改變，美國僑團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密切關係，這一環境隨著洋洋萬字的序言而展開，並且更加周密。本書的目錄及跋又提供了補充信息，再次構成了一個澳門及東方的代表形象。本日記在海上旅行開始一週後便開頭，分為8篇或稱8章。每篇由作者發給收信者的卷數構成。目錄簡明扼要地反映了書的結構及作者（在時間及空間上的）行蹤，例如，：“遠航去馬尼拉／澳門／……廣州……／澳門／……在滑鐵盧船上……回航……。”，澳門是本書的中心。從第一節及最後一節的題目及對哈麗特旅行的描寫可以看出，具有一種循環的特點。對在4月至9月間澳門城男子頻頻出入廣州城期間，¹⁰她在澳門渡過的時光均有反復的描寫。對在蘇門答臘號上倖存（生活）過的這位美國旅行者——“被迫在外國氣候中活動”（星期日，1929年5月31日，第2頁）——由於旅途的寂寞，她開始了以後在澳門繼續的消遣之一——閱讀。她不僅欣賞小說，而且涉獵宗教書籍，如佈道詞。此次旅行如同慢慢獲得了一種初始儀式的地位與意義。它促進了作者的成長與成熟。我們將看到，其在華期間，此次旅行的意義越加重要。哈麗特的學習過程始於在馬尼拉的停留。在此，她有一種第二故鄉的感覺。她目睹了幾次葬禮，後在一“人種學”簡記中對此有描述。¹¹

年輕洛的生活空間及時光中有著埋沒的時刻，但無值得記載的事情。這種沉悶經常不斷。她在與姐姐的密切通信中有所承認。她評述了涉及某

10. HL，前引書，第66頁：“1830年，4月29日，叔父和羅素先生從廣州得到了公函，明天將離開我們；我們足足呆了一陣子。啊，我無法忍受這經常的分離！但在這裡，命運便是指令！”在1832年寫給其父母的一封信中，哈麗特承認對其叔叔亨利·洛的健康及對在廣州經商的男人回來時那種半死不活的外表感到擔心。這更加說明了在澳門的“外國人”（男女）日常生活的背景：“叔父在澳門，和我們一起6個星期，這對他很好。他下來時身體非常瘦弱，但他再次離去時，我們看見他胖了，判若二人。……我害怕他冬天去工作，為他擔心；他長期坐辦公桌十分艱苦。……柯立芝變了許多……。”（哈麗特·洛《澳門，（夏季），1832年》，載埃爾瑪·洛伊內斯（主編）《中國貿易》，1953年，第52頁）。

11. HL，第1923頁。1833年2月，作者描繪了廣州的一個華人婚禮。

些題目的決定：“1829年6月16日。……你或許將說，傻瓜，在日記中寫下這樣的想法！。但這不是甚麼一本稱得上堅持不懈的日記，我認為，我並未認為它應該是……這是為你為我寫的，所以，我可以坐下來安心寫，敞開我的心懷。”（第6頁）。¹²在澳門居留的第二年，我們的作者在閱讀了拜倫（Lord Byron）詩歌後，也寫了一首詩。她的叔母想送到《澳門雜錄（Canton Register）》¹³上發表。如同D夫人所言，想把她變成女拜倫。¹⁴

氣候也成為本文通篇的主題之一。或許它影響並決定了作者的精神狀態及行動自由，¹⁵她常常比較奇異（不同）和熟悉的東西，以便其姐姐理解並對她的經驗及周圍環境有所認識：“1829年8月7日……好似美國4月的天氣，晴朗、多雨。我想你熱極了，雖然我們還要戴鬥篷，穿大袍。”¹⁶

第1篇第3部分跟蹤描寫了1829年9月29日她乘坐的輪船抵達澳門沙瀝（Macao Roads）¹⁷的情況，羅素已經在陸地上等候洛家人下船。實際上，第二天纔下船。哈麗特向茉莉描繪了這個將會渡過她漫長四年，充滿異國情調生活的城市的最初印象：“此處各種船隻繁多。全家人居住在船上，的確，二代或三代同船。婦女操著小船，身上背著嬰兒——這是窮人帶孩子的通常方式……。有時她們對孩子非常殘酷。中國人的一個想法使我極為發笑；那是說，船不可無眼睛行駛。因此，他們在船首兩側各畫上一隻大眼睛。非常醒目；如果你問他們為甚麼，他們說，啊呀，沒有眼睛怎麼看？”（第27 – 28頁）。¹⁸

12. 1829年10月9日，哈麗特對其姐姐說：“我相信，你有大的耐心，可以在這本日記中得到許多東西。”（第30頁）。

13. 1827年由馬格尼亞克洋行的職員三孖地臣及年輕的美國記者吳特創立的英語報紙。

14. HL，前引書，1831年4月10日，第93頁。

15. 1830年8月30日，作者描寫了一次襲擊澳門的颱風，一年後仍可見到它所造成的巨大損失。從南灣的船隻，屋頂到西望洋堂這樣的文物建築。颱風後，又颳起了華人稱為“颱風之母”的那種風（第106頁）。1833年8月，另外一次颱風又給澳門帶來了破壞。房屋顫抖，洛家的僕役向外排水。對此哈麗特描寫說：“中國的窗戶不防雨水，我們家常常如同水塘一般。”（第227頁）。

16. 1829年11月1日，作者對澳門仍有的好天氣感到高興，她不由得同美國此時必須燃用的壁爐相比。她說真想讓所有殘疾人來享受澳門的好天氣。

17. 哈麗特在抵達澳門前三天

她在澳門親眼目睹各種不同形象，留下了印象，但很快便轉向澳門的文化多元性。從海路進入澳門的作者的第一個評論是關於澳門水上人口的。¹⁹ 人口的代表，即男性與女性的象徵意義在作者的筆下平分秋色。它包含在“異情美”²⁰中，蜑家女（女漁民）的形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對異國情調²¹的憧憬隨著作者在澳門的每日遨遊，尤其是華人墓園中的漫遊濃縮成了作者描繪的一系列形象（第59頁）。澳門的異國情調轉向了不同的概念，同樣與澳門生活的歐洲情調交融，當然，這是她較熟悉的。其獨特性來自於澳門人文景觀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與生活方式交織而成的畫面。這是迄今為止澳門最佳的多元文化平臺。從古至今，澳門從來便是見證不同種族、習俗及宗教跨文化共存的最佳之地，如同作者在欣賞完歌劇後，在暴風雨中發現的那樣：“苦力們戴著大大的帽子，趟過沒膝蓋的水，手裏提著燈籠，一幅異鄉的畫卷。……我

理旅行及想像的人生經驗相混淆。它傳播了每種文明對其他文明所持的截然不同的形象看法。在此情況下，是新成立的美國對19世紀的澳門文化，宗教及政治環境的看法。作者的旅行，無論現實的還是想像的均具有象徵意義。它圍繞時間，地點及來往於這個由葡萄牙管理的地區人流活動的表象展開，而這些表象有時具有象徵意義。做為他人特徵的美學特點，我們可以列舉一些質量的指數，使讀者進入一個與其不同的語義世界。此處充滿了‘高尚’，五彩繽紛的建築，宗教節日，民間傳統，文體活動，服飾及髮型，還有其他成分。對異國情調的描寫可採取比喻或一種假設或對現實不熟悉的技巧，幫助讀者解讀，有時會進入其‘展望的地平綫’²³。澳門的其他人——歐洲及華人天主教徒——於是被發現或掩蓋了。這是通過對一個一半了解的世界的排比獲得的。為了反映它，需要有修辭方法及特殊的語言。在本日記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的形象及異同的比較。

既然作者的擔憂與渴望在日記結構中頻頻出現，不可忽視日記產生的環境：

“澳門從海上看起來很美，有些浪漫的情調。我們到達了……坐上轎子去了我們的住所……澳門的街道狹窄、曲折，但我們有花園，這增加了樂趣。實際上有兩個花園，一上一下。所有小路是用石板鋪的……登高可以將海灣的美景及全城的景色一覽無遺……太陽臺和那裏的許多美麗植物。這些美麗的裝飾及幾隻鳥使我感到非常舒適。我真沒有想到這裡是那麼美，但我要好好享受享受它。”（第28頁，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埃爾瑪·洛伊內斯刊布了作者寫於1829年10月2日的一封信。它以更多的文字描寫了抵達的情況及對澳門城的最初印象：

“……10點鐘到達澳門沙瀝，那天一直呆在船上……我們大約在10點到達澳門。我們登上了交通艇。我平生第一次有幸乘坐一架由兩個苦力肩擡的轎子通過澳門街道。你看看我是如何抵達的中國……。你喜歡知道我們在澳門的情況。我是多麼喜歡這個地方的景色。從海灣望去，澳城風景絢麗，白色的大廈隱沒在濃綠中。站立在小山上，海灣與港口的景色美麗如畫。街道彎彎曲曲，沒有比想像再彎曲了。你可別上街，因為道路狹窄，上街就好象你在房子之間穿行，但我們的住宅是令人愉快的，它有最浪漫的景色。我們看不到街道，透過門，可以見到一點。房子全部被高牆包

23. 參見義賽爾（ISER, Wolfgang）《讀書法案：審美反應理論》，1980年，第99頁。

園，但房後有花園，一上一下……你可以去中國式的花園。我很欣賞它。這裡的樹木井井有條，十分雅觀……有爬藤，忍冬等……你登高……如同來到一個眺望臺，房間四面有窗，從此你可以看見海灣和澳門的一切。一片白色隱沒在濃綠之中。”²⁴

除了澳門城典型的小街曲巷²⁵及人文景觀外，哈麗特在花園及澳門的望臺上通過眺望，獨自享受了田園般的快樂時光²⁶。這位年輕的美國姑娘讚美澳門美麗的風景。社交生活緊湊，洛一家很快學會了當地的習俗並覺得頭痛，要盡快回訪一切來訪，“這如同本地的標誌，是個話題……我們很快坐慣了轎子。先去費倫夫人那所位於澳門盡頭的豪宅。那是一個浪漫的地方。好似一座完善的天堂……遊廊地上鋪著大理石地板，裝飾著植物……，房間很大，整個房子好似宮殿。”（星期五，1829年10月2日，第28－29頁）。儘管各種局限及社會習慣，作者把生活安排得十分緊湊：“星期五，9日……我很想去散步，有了轎子纔可以（轎子還在廣州訂做）……。”（第29－30頁）。

一、“花旗鬼”：美國人在華南及其貿易

“中國的綽號，如果不是花哨的，就是隨便亂起。1784年，當中國皇后號懸掛著新製作的美國國旗出現在澳門時，中國人為由星和紅、白色條紋的奇怪組合所吸引。於是稱呼它為‘花旗’。這個名字便沿用至今。”

白樂賈《打著花旗：美國人在澳門及華南概述》，1940年，第1頁。

-
24. 哈麗特·洛《致瑪麗·安·洛信。澳門，1829年10月2日》，載埃爾瑪·洛伊內斯《中國貿易》，第3132頁，黑體為我們所加。
25. 1829年10月18日對漫遊的澳門街道又做了描寫：“這裡的街道令人難以忍受，高高低低，曲折，地面鋪得很差”（第32頁），1831年12月15日又有描寫：“……要走好幾年的時間纔可以走慣這些這些粗礪的道路和小山。值得慶幸的是我很快習慣了，走山丘如履行平地。”（第111頁）。同年8月17日，作者被迫在非洲奴僕的武裝護衛下步行去欣賞歌劇。這是她的又一勝利。她再次描寫了澳門的街道：“……街道的路面很差……。街道的整體寬度比你那裡的路邊還窄，有些地方鋪了路面。……。”（第223頁）。
26. 此種看法形成甚早。1829年10月24日她寫到：“晚飯後，感到心情低悶，於是回到我們的夏天別墅，遠離塵世。我拿起了鉛筆，作為一點小娛樂畫了一個週圍小山的速寫，它非常漂亮。速寫是件令人愉快的工作。”再次回憶了通過其繪畫記載了19世紀澳門的英國畫家錢納利（1774年1月5日－1852年5月30日）。哈麗特與其有私交。關於澳門外國社團的房屋及其花園，可見克利斯（COLLIS, Maurice）所著《外人的誹謗》，1946年，第244頁。

在費城的鐘聲奏響了美國獨立的凱歌後不久，一批新的商人來到了華南。現在他們擺脫了英國王室的羈絆，通過與中國的茶絲及其他貨物貿易，²⁷ 無數的美國家庭，²⁸ 尤其是新英格蘭的家庭，²⁹ 積累了財富。對於這個新生的國家的商人及冒險家來說，這是一項誘人的活動。哈麗特在描寫與M先生告別時涉及了這些巨大的財富。M先生在中國20年期間積累了大量金錢，帶回美國（第152 – 53頁）。道斯³⁰也描寫了在廣州貿易及在澳門休閒的情況。休閒期間，女人纔有家人及男性朋友做伴，因此纔有許多歷史家筆下的“廣州社團”³¹一語。美國僑團僅僅是指男人部分。52名美國商人及其家人來自薩利姆。他們途經波士頓，合恩角，然後再轉好望角；有的來自貝弗利及美國其他地方。現在他們長眠於澳門的新教墳場。³²

是在洛家族的城市建造的，於1785年為薩利姆的商人開通了貿易渠道。花旗國通過薩姆爾·斯諾於1807年在東印度公司³⁴已立足的廣州設立了一座商站³⁵。美國公司的職員及股東撰寫了一些今天已經成為經典之作的關於外國人在珠江口三角洲的著作。³⁶

在19世紀20年代，幾家美國公司已經控制了中國貿易。廣州最大的公司屬於紐約人托馬斯·史密斯。從公司的總體來看，有奧利凡特公司；韋特摩公司及珀金斯公司。最後這個公司成立於1806年，後為旗昌洋行所兼併。³⁷

二、多種宗教共處

除了文化衝擊之外，美國僑團也必須遷就澳門城的

日，她的日記中涉及精神及“日常”兩方面的層面是不足為奇的。起初，最使作者吃驚的是社會宗教活動是彌撒後的主日互訪。它與薩利姆在主日所作的靜修不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有對中國傳統的陰曆年喧鬧的節慶及澳門天主教出遊的描寫，但這位年輕人不知道它的象徵意義，更無法解釋這些節慶：

“10月11日，星期日。……你無法想像在此保留我們的宗教感情，以我們的方式過禮拜日是多麼的困難……。此處看到的不像我們國家的宗教原則。華人不分甚麼禮拜六，如同週日一樣工作。你可以聽見他們的樂聲，一會兒就響一下。這是如同天主教徒舉行宗教節日的一天。……我們的買辦（管家）³⁹阿偉下午進來問我們是否想從這個大陽臺看天主教的出遊，值得一睹為快，不過我不可能告訴你這意味著甚麼或任何有關的意義，除了那些穿著寬鬆白色緞長褲的男人外……他們舉著點燃的蠟

……沒有戴帽子。4個男人抬著彩車，上面有我們的救世主的畫像，他擔負著十字架。……而後跟隨著更多的神甫，他們在歌頌；再後是軍人的樂隊；最後是身著普通服裝的公民。鐘聲大作。無次序，百姓也不遵守次序……看上去他們好像有點激動。他們手持長明的蠟燭，但也把它作為防禦武器使用。他們通過時，將蠟燭伸向孩子們的臉龐。……現在是四旬齋。還有許多這樣的出遊。”（第55 – 56頁）。

哈麗特強調說她不願意評判任何人，但最後她還是這樣做了。她承認不理解這些人民宗教性的表現形式。她通過回憶而描寫的遊行隊伍很有意思。通過它，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薩利姆姑娘的頭腦是如何攝取，過濾並紀錄了這一儀式。在此儀式中參加列遊的成員如同描寫的那樣象徵性地分開。男人脫帽說明對基督的聖體及彩車及旌旗中聖人的尊敬。這位美國年輕人可能不了解

中，看上去他們站立在無立足點的地方，他們被巧妙地支撐著……就像一個小維納斯從她的殼中出來，還有成千上萬的其它事，我不可能——記住……啊，我不能忘記那有趣的豬！可憐的小豬被屠宰了，做成了烤豬，用汽車運載。有一隻羊羔……擺在汽車上，栩栩如生……你要知道，所有婚姻隊伍，葬禮，或無論甚麼儀式，這些可憐無辜的豬都是犧牲品。裝載在汽車上，飾以水果。我想是送給神的禮物。”（第70–71頁）。

這位年輕的姑娘無法以文字表達華人遊行隊伍的多種異國情調，於是她試圖過濾最引其注目的一些細節，例如，服裝，所歷數的顏色及聲音，不斷使用形容詞“splendid”及其副詞形式“splendidly”此外還運用了具有意義的疊韻，其節奏如同象聲詞躍然紙上；驚嘆及問語又增強了此種氣氛。通過對華人奇裝異服感覺及她認為不過

將死者埋葬在教堂裏⁴⁶。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可怕的做法。遺體放在開蓋的棺材中在街上運過。遺體置放在教堂內，然後不加棺材放入墓穴。先塗以生石灰，然後由黑奴埋入地下。當肉體腐朽後，取出骸骨，在男性朋友的跟隨下舉行葬禮。神甫在教堂中歌頌、宣讀禱告。在這個人去世及下葬時，鐘聲一時大作……。如同在所有天主教國家，神甫們的禱告收入不菲。人們告訴我說，這對窮人來說是一種十足的逼取。”（1833年2月17日，第176頁）。

1833年7月皇太后去世。中國的傳統習俗是百姓必須帶孝百日。男人不得刮鬍子。這在作者的筆下有所描寫。對中國的葬禮，哈麗特描寫如下：“澳門的富人將他們的死者藏於最高的山丘上面，墳墓附近裝飾許多石製品。”（第221頁）。

是如此，例如，1832年12月7日，當幾個盜賊準備破門進入洛家的住宅時，我們的作者高呼到：“如同所有在廣州的紳士，他們沒有機會顯示他們的殷勤。”（第158頁）。

哈麗特生平第一次於凌晨三點離開一個的確確有世界各國人參加的晚會。⁴⁸那裏可以看到奇裝異服（“各國及所有年齡的時裝”，第31頁），⁴⁹可以奏樂⁵⁰，可以在主人家中燃放焰火（第31，43頁）。根據道斯，“在締約之前的幾年，在澳門，英、美人的在華社會生活獲得了最充分的發展。兩國商人定期退回上流社會，腐朽葡萄牙殖民地成為了阿斯科特賽馬場，蒙特卡洛，利維旅，成為了在商館繁忙購茶季節以後疲乏的商人的家。”⁵¹

“你不會想像到呆在這個地方是要多麼考慮週詳！這些閒言閒語不僅有關我，也涉及整個女性⁵³，但是我打算從別人的經驗得到教訓。這是一位在澳門呆了六個月的婦女。感謝運氣，她現在不在了！這件事使我很憂鬱……。這是一種無情的生活方式。但少許還有些信心……我無人結伴而行，並不是要去甚麼地方。（11月12日；第41頁）……如果這裡有許多女子，不會有這個問題，但你知道此處婦女缺乏。這裡有二十名男子，女子稀少⁵⁴。儘管我是此地唯一的未婚女子，仍無敵手。”（1829年11月18日，第44頁）。

約三年後，作者因同一個男朋友——D君——夜間出遊數次而遭到了澳城的非議，對此，我們的作者一笑了之。但她擔心這些傳到美國家人的耳朵裏去，因此她渴望一個自由的未來，不要奴僕，沒有無知這樣的障礙，沒有這些

這些漫遊中遇到了：“葡萄牙人和華人非常懊惱她專心注視他們。”（星期日，10月18日，第32頁）。在出遊中她遇到了兩個纏足的華人女子。後來，根據她的親身經驗對此習俗做了長篇的精彩評論：

“……我們看見兩個小腳婦女。雖然常常聽說起她們，但我仍驚訝不已；我從未相信過它，並且總假設這是騙人的話。這些婦女的腳如同我們的小查利⁵⁸的腳般大小。……我認為她們一定是在受苦，但看她們走起來很舒適。兩名婦女在搬運藤條（第32頁）。 ”

通過日記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說男女之間的差別的確是一種世界性的區分，那麼在不同的文化 / 社團中，二者之間的關係，生理的不同，每人在人類繁衍中的作用

那些與男性有關的問題 / 態度，社會作用及成見等等受到空間及歷史時間的影響，因此從文化的角度而言，是相對的。⁶² 本文其他章節中直接或間接涉及的其他問題與此主題有關。1829年11月1日，洛家接待了華商莫官的來訪，哈麗特問他為何不允許歐洲婦女進入廣州城。來訪者以洋涇濱英語熱情地回答說：“‘您儘管看。’他還說，‘廣州太小；沒有甚麼地方可去的。’”（第38頁）。

初次去位於黑沙環的跑馬場時，⁶³ 作者也對葡萄牙人及華人社團進行了描寫。這是澳門的另外一項吸引人的娛樂：

“1829年11月5日，……但我沒有認為應該享用。跑馬場位於所謂的關閘附近⁶⁴。它防止所有外國人通過這裡

種宗教反感。她坦白地說，在目睹了他賭馬後，不再願意去聽他的彌撒。通過靜讀佈道詞來代替這一宗教儀式（第40頁），開始盼望由不常來的輪船帶來的信件及家裏的消息（第52 – 53頁）。

澳門的娛樂很多。（1829年11月14日），這位美國姑娘首次參加了在青洲舉行的潑水節。⁶⁷ 此間的四週景象使得作者描繪了一幅獨特的場景。其中不乏“人種學”方面的憂慮：“附近的風景令人愉快。太陽已西斜……澳城沉浸在柔和的夕陽中，變得更加美麗。我們一靠近，前面這個繁忙的場面變得更加新奇與悅人。那些可憐的水上居民看上去十分愉快。”（第42頁）。約一年後，哈麗特在著名商人孖地臣的陪伴下出遊了灣仔：“我們參觀了教堂。它位於一風景如畫的高高

頁)。同20日一到廣城⁷⁰，便被召去見行商⁷¹。澳門的女性每天感到社會的壓力及禁止，例如，上街必須乘轎或有人陪伴。這與洛家族在美國的那種自由的私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照⁷²。所以我們年輕的作者在一艘帶來家鄉信件及報紙的美國船隻停留在澳門附近時，發洩說：“多麼渴望成為男人，那樣我也許可以到船上去好好看看！”（1830年2月25日，第53頁）。在東印度公司組織的一次晚餐上（1830年5月12日）她也抱怨了男子社交禮儀對婦女的限制。這些限制使婦女變成了“可憐的從屬者”（第66頁），例如，在一羣美國婦女跟著英國婦女前往廣州時，她終於有了體會權利願望的機會。她女扮男裝，在沒有喜歡向她獻殷勤的男同胞的幫助下進入廣州城。⁷³1830年11月

國婦女在廣州的出現可能危及整個帝國的貿易（第80頁）——，此事使我們的作者，這位衝動的冒險家怒不可遏。本來她計劃在廣州逗留的三個月內好好享受中國的新鮮事，但不得不在三週後返回現在更加誘人的“東方明珠”。威廉·亨特描寫了圍繞這批外國女人來到廣州華人的行動摘引了當時的幾封信件（作者不明）的片斷來敘述此事：

“早晨與幾個美國人去公司的小禮拜堂聽韋切爾牧師講道，並看幾個‘番鬼婆’，她們是廠長的妻子貝絲夫人，還有羅賓遜夫人，費倫夫人。但貝絲夫人是她們當中最美麗的一個！她穿戴的全是真正的倫敦時裝，我們對此十分欣賞，而中國人則認為‘可怕’。在‘天朝’見到外國婦女是一件非常奇異的事，一件從未出現過的事！幾天之後，她們還未等到官員，就以停止全部貿易作威脅離去！”

子氣慨是違反文明的……。這些比喻是可以算作知識的重大構成部分。”⁷⁹ 權力或接近權力在許多情況下來自於所屬的人種 / 種族及性別。人種 / 種族又來自於所享受的社會地位，因此哈麗特羨慕已婚女子在丈夫週圍獲得的權利的小天地的自由（第133頁）。無論是男是女，經濟社會選擇的另一途徑便是加入在澳門歷史悠久，頗受敬重的教會團體。作者在英國牧師韋切爾⁸⁰ 陪同下，目睹了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出遊及在聖家辣修道院小堂中所舉行的一位嘉諾撒修女的告別儀式，可引以為例。告別儀式的簡單使作者十分失望。她從主祭臺上目睹了一切。先由一位神父以拉丁語做祈禱“（可惡的生物）”⁸¹ 修女緩緩登上祭臺的階梯，神父在她頭上灑些聖水，然後她馬上進入修道院，永遠離開塵世的欲望。交響樂團的演奏令人記住這一

澤·馬托索主編的《葡萄牙史》，第5卷：自由主義，讀者圈出版社，里斯本，1993年，第65 – 87頁。

瓦爾特（WALTER, Eugene Victor）《地方道路：人類環境的理論》，Chapel Hill，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1988年。

韋雷（WILEY, Peter Booth）《揚基在神之地》，維京 / 企鵝出版社，紐約，1990年。

沃爾夫（WOOLF, Virginia）《弗吉尼亞·沃爾夫1915 – 1941年的日記》，第1卷，貝爾作序並註釋，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紐約，1977 – 1984年。

<

